

目 录

第一章 对人间的挚爱关注 雅俗景观

- 一 人物以某种生存方式在城市中活着/3
- 二 人物以某种秉性手段在城市中闪现/7
- 三 人物以某种事迹活在历史趣闻中/11

第二章 抚摸生命中的亮色 温馨情爱

- 一 他和她因为孤独 遂成好合/17
- 二 他与她互为情动 却难成眷属/21
- 三 她与他曾却为情所苦；“我”深深理解之/23

第三章 “我”的“在场”：身为远客

- 一 “我”为游子/29
- 二 “我”为作家/32
- 三 “我”是赎罪者/38

## 第四章 创作生涯中的过渡履迹《忸怩》

- 一 人物精神追求与现实处境矛盾的刻意化/48
- 二 人际关系的诗化/50
- 三 叙事模式的因袭与悖反/52
- 四 “忸怩”的原因/54

## 第五章 叙事视角的多重变奏 :叙事方法

- 一 第一人称主观叙事/58
- 二 第一人称客观化叙述/60
- 三 第三人称客观叙事/62
- 四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混合交织叙事/66

## 第六章 乡土·文化 :胡地风情

- 一 吃 :文化关注的焦点之一/73
- 二 色 :文化关注的焦点之二/79
- 三 胡人 :文化关注的焦点之三/83
- 四 侨民 :文化关注的焦点之四/86
- 五 宗教 :文化关注的焦点之五/89

## 第七章 小说文体的别样风貌 :笔记小说

- 一 写人 :七分素材 ,三分水墨/102
- 二 品鉴 :妙语析词 ,微言伸理/105
- 三 人物话语/112
- 四 人生写意/120

## 第八章 创作个性的彰显 :叙述语言

- 一 典雅简约与淡泊事实/124
- 二 反讽语境与中立格调/128
- 三 诙谐幽默与凝重真切/134
- 四 词语的新奇组合/139

## 第九章 未竟的“文本”阅读 :阿成其人

- 一 生活中给人的印象/143
- 二 小说家阿成/148

## 附录

- 阿成 :走近千手千面的女神/156
- 阿成创作年表/163

## 后记

## 总 序

##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顽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隄、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黑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哲

人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予、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卓越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惟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担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瞻学养的短匮,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 11 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摒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 第一章

# 对人间的挚爱关注 :雅俗景观

也许是艺术的宿命,阿成对凡夫俗子情有独钟。俗者,凡俗之谓也,非庸俗之谓也。且从人的角度而言,孰敢妄言他辈庸俗乎?这些俗人常常称不上人杰豪俊。可他们既然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即使生活在许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却依然以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证明着他们鲜活的生命曾在某个地方留有痕迹。他们的音容笑貌、脾气秉性已融入漫长的历史记忆之中。

可惜,记忆的遗忘品性加之操纵人们记忆的主流话语常让人们忽略他们曾经存在过。似乎,他们那种为文明人正常生活轨道所抛弃的尴尬的生存方式离我们太远;似乎,我们大致属于“雅人”一类的人群,文化、伦理、风俗上的差异使我们不屑于俯首关注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即使是我们披译过他们善良的暖意、慈爱的光辉也觉得很正常。其实,这正是文明人精神人格上的妄自尊大的缺陷。我们的眼睛关注的仅仅是与自我利益相关的人与事;我们总是疾言厉色地追逐保护属于

自己与可能属于自己的利益。久而久之，胸襟变得狭小逼仄，情感变得萎顿浮靡，意志力、判断力失去应有的硬度与尖锐。我们的亲情、友情也会因之反目，天下在意识深处变得惟我独尊。那种博大宽宏的度量、慈悲哀悯的情怀、坚忍不拔的意志、反省自新的人格魅力已渐离我们远去。我们还能正襟道貌地说我们是雅人吗？

阿成的一组小说“人间俗话”是一种艺术的征兆。他没有忘记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俗人们。在我看来，俗人形象的刻画已渗透到其他不同标题为组的小说中去了。如“人间揽胜”、“春风自地扬花”、“风流慷慨过流年”等。或者说，俗人形象是阿成小说的主干。即使在所谓“天堂雅话”中，俗人犹存。更进一步地说，在阿成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所谓正面高大的人物形象，更找不到那种叱咤风云、振臂一呼而应声云集的英雄。这是否也算是阿成独特的艺术追求呢？

俗与雅相对。阿成在刻画描写俗人，叙说他们的故事时；常常使俗人们流露出一一点“雅”来。这“雅”在“俗”的背景下常显得熠熠生辉，令人目眩神迷。雅，无非是文明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表现。阿成深藏不露，不加褒贬，又常常在刻画“雅人”之中使他们呈现出一种俗相。这背后的心理动机恐怕是：既然是人，何论雅俗。可这么一来，小说即使篇幅长短有别，多因成竹在胸，轻轻点睛使得小说的意蕴变得丰厚起来。而在读者看来，当我们以一种相对平静优越的心态阅读阿成的小说时，无论是感受俗人们的苦难艰辛，还是领略雅人们的矫情浅陋，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俗人雅人们的生活烛照了我们的人生，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优美优适

与缺陷之处，这种贴近真实人生的感觉是阿成传达给我们的，情不自禁地让我们由衷地向这位知心朋友般的作家致以真挚的谢意。

## 一 人物以某种生存方式在城市中活着

“掌鞋的”、“卖针的”、“卖胰子的”、“卖假药的”、“良娼”、……这些人姓氏名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姓名属于那种有户籍、有单位、有人事档案、有领导、有党支部的人们的。可他们有“人籍”。他们在城市的某一角落，默默无闻地，偶尔发出职业性的声音。比如：“好胰子，又来嘞！好胰子，又来嘞！”“各位老少爷们、大叔大婶以及小朋友们，这是什么？碎玻璃！这东西能吃吗？那位说了，不能吃！可我金猴子偏要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能活下去，选择一条生活的“道儿”。这“道儿”表面看来对于时代历史的进程毫无影响，而细品之，则让人感觉到，琐细庸凡的生活正需要他们来填补一些服务于社会人生的空白；或者，给人们带来某种无伤大雅的生活情趣。

他们既然是人，以某种生存方式招摇过市也就具有了相应的合理性。同时，他们也有各自的性格、情感。那“卖针的”在看成群的鸽子在悠然渺茫的天空中翱翔的时候，禁不住随之心驰神往。因为，虽然他身在哈尔滨，心却在常飞往自己的家乡：河南。买针的女人们走净了，“卖针的是一副很惆怅的样子”，含蓄已至无言，只有思乡的耿耿思绪随鸽子的翅膀动

而“翔翔落落”。而那“卖胰子的”亦是同样，从山东来到东北，一副“笑咪咪的样子”，给人们的感觉是，对他这样的生存方式的怜悯多少有点自作多情，你看他“童心很盛”地与孩子们唱歌谣，夸耀着女人们的干净利落。尤其，诚挚到了对他人与自己间的距离视而不见，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各位婶婶，大姐，老妹子，明几个，就要回山东老家啦……”这自言自语的宣告，隐涵着几多出外谋生者的心酸与希冀。而那给道里区许多人掌过鞋的李瘸子，胸前挂有好看的军功章的“掌鞋的”，在自己店铺上书上“李瘸子”，或许是唤起人们的怜悯或许是昭示自己的不幸，或许是让人们易记这商标性质的招牌。无论怎样，这是对自己生活处境的一种坦然面对，对自身命运的坚韧承受，即使那些说是为他介绍女人的媒人们骗了钱却仍不失要女人的玫瑰色愿望。这是这残疾人的梦魇，纵然空落，可毕竟比无梦强一些。他默默地宽容忍耐那些身体并非残疾的人们的敷衍了事乃至哄骗，将一切装在心里，依任聪明的正常人的所为所作和遗忘。也许，如李瘸子这样经历过人生死亡之阵的人无须再过多地说什么了。

《良娼》是以人物对话的简练含蓄、人物关系的妥贴恰切而为时人称道。嫖客宋孝慈倒是有名有姓，“且一身英气，且行止温文尔雅”。可终归是不敢申报真名实姓的嫖客。而母亲则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谋生的娼妓。嫖客与娼妓的关系按一般人眼中的理解是一种雇佣驱使与被雇佣被驱使的关系。而在这里，宋孝慈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则是充盈着一种宇宙天地间的善良温情。无论是宋孝慈宛如丈夫一般的关怀疼爱，还是母亲对宋孝慈文明人身份的庇护隐匿，

皆出自于普通人的诚恳真挚。尤其是母亲，再见宋孝慈时对江老先生说：“宝儿，这是你舅舅——。”是想让宋孝慈摆脱一种为父为夫的伦理压力，这也许不能简单地视为是恪守娼妓的行规，更重要的是母亲重情重义的美德虽被社会尘埃覆盖却依然如金子般闪光。临终前又告诉江老先生：“不到饿死，不去找你。”这是何等的自珍自重！“找你”，意味着让对方承担必要的责任与义务，意味着可以待价而沽的骄矜，意味着弱者的哀怜与求救。“不到饿死，不去找你”，等于永远不去找，永远不给关怀疼爱自己的男人添一丝麻烦与累赘。这是以娼妓行当谋生的母亲的人的尊严。这种道行操守真乃“良娼”也！无怪乎“宋孝慈听了，泪水止不住，就任着蜿蜒下去……”

在阿成的小说中，以某种生存方式活在城市里、乡镇中、河边、路旁的人很多。如《正正经经说几句》中，卖野鱼、修伞的；《拉手风琴的》中的谢辽沙……多数俗人操起文明人不屑于为之的营生是迫于生计，但也有因特殊的生命变故让文明的社会抛向了鲜为人道的生活角落。《鱼风》中乌苏镇泥房的主人瘸子刘坤一手灶上的手艺，被当地人称为“有绝活儿”。原来他是从乌鲁木齐跑到这乌苏里江边的。少年的惬意，青年的“憨直与清秀”皆因一场“生活错误”而变成难以成性的回忆。文明社会的伦理规范的残酷性似乎非常吝惜宽容与忠厚，使得那些偶尔失足的人无可奈何地飘泊异乡。

从阿成选择这类俗人为叙事对象而言，可以给予我们以下启示。一，俗人雅人皆是要活着。生存方式是善良的人们赖以存在的方式。无论沧海桑田、时代更迭，谋生是人类共同的基本需求。俗人的生存方式以至生存技艺正是人类生命本

质的一种对象化。二,俗人们的生存方式自然决定他们特有的精神文化特征。沉默寡言,忍耐承受命运的安排,一种苦涩的悲凉渗透于他们言谈举止之中。宽容地对待他们的生存应该是文明社会引为警觉的问题。他们是我们的同类,是人,是生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与襟怀博大的小说家阿成构成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三,俗人的美与苦涩并存。汪曾祺笔下的乡村图景常有世外桃源般的单纯之美,最具代表性的如《受戒》。历史的记忆在汪曾祺这枝如椽巨笔下具有牧歌般的悠闲与恬淡。这种净化了苦涩的生活是一种文人化、文学化的生活。这与汪曾祺的艺术追求密切相关。阿成对于这种单纯的美并不回避。但他关注的俗人常常是在尴尬的生存境遇的掩盖下却不丧失一种真挚、本分甚至乐观。也许,这样的俗人愈发显得真实。四,俗人的生活再现是一种文学观的独特表现。阿成笔下的这些俗人难以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因为大雅之堂是为文明人设置的。即使文明人受苦受难也多与民族的兴衰、时代的进退相关。阿成有意识地避开常规的束缚,按自己的情趣选择了再现俗人生活窘相的叙事视角。也许他无意于成功,只是想跟朋友们唠唠他所熟悉的俗人俗事,却不想这种独特的文学观念多少带点儿“谋反”的性质,使人们在阅读具有明显的教育、认识、审美意义作品的接受定式时受到一种冲击与震撼,不得不对这位小说家刮目相看。